

第一章

緒論

除了上述恐怖事件，還有一場奪走大量外國人性命的致命熱病。人們猜想熱病是建城期間裸露分解的花崗石所散發的有毒氣體所致。必須承認，香港島確實應當獲得「歐洲人墳墓」的名聲。

在過去25年，這座島及原住民都經歷了非凡的變化。一座輝煌城市已從光禿石群中建成；山坡上樹木繁茂，不僅增添了此地的如畫風景，更大大淨化了空氣、改善了居民健康。

——約翰·湯姆森 (John Thomson)，
載〈香港〉，《中國與中國人影像》(1873)

蘇格蘭攝影師約翰·湯姆森在踏上中國的開拓之旅前，為香港寫下這段手記，那時這座港口城市已成為外國居民和獵奇遊客的避風港。對湯姆森等眾多西方人而言，與中國的相遇始於香港——它既是大本營，又是門戶。作為進入廣袤大陸的第一站，香港島像一個前景框，鮮明呈現出後方大陸之遼闊。它壯觀的拱廊和階梯式街道，以其穩固堅實的確信姿態，平衡了香港島社會轉瞬即逝的氣息。原本荒蕪的山坡最近透過植林，讓空氣瀰漫著濕潤的芬芳，猶如一座花園綠洲中的城市。貿易繁榮；犯罪可控。如今，它是一座殖民地，與對面的九龍隔港相望(圖1.1)。不過，當時的老一輩只要稍加回憶，就能記起這樣的變遷絕非必然；事實上，香港一度瀕臨失敗。



圖 1.1 約翰·湯姆森，1868 年香港島海旁道（現德輔道）景觀。© Wellcome Collection, London (18693i)

香港的早期城市史——其時僅含香港島——曾以多種方式被書寫：從對土地移交、民事和商業管理機制的研究，到華人精英與日俱增的影響。而奇怪的是，作為主要的世界性城市之一，香港目前卻缺少一個系統連貫的研究，去探討 19 世紀中葉這座殖民地城市是如何岌岌可危地建立並「實體地」發展起來的。我們始終沒有系統地理解，這個地方是如何從時任英國外相巴麥尊勳爵 (Lord Palmerston) 的著名譴責——「屋瓦難尋、荒涼不毛的島嶼」，搖身變為功能健全的城市。¹

通過閱讀各種史料可明顯看到，1840 年代初在殖民地香港生活的定居者，開頭絕非一帆風順。這段時間充滿各種各樣人為的、自然的創傷，香港被折磨得千瘡百孔。有時，自然所產生的變動甚至也會不經意間被人為因素放大。與歐洲殖民者其他許多在熱帶、亞熱帶地區的定居地一

樣，香港初期的外來者不得不應對惡劣氣候所造成的後果：颱風、暴雨、酷熱潮濕的日子，連帶突發火災，如同火柴點燃火種，席捲早期滿是竹、蓆和木材（當時的主要建築材料）的城市。而人為衝擊方面，本地強盜、公路劫匪和海盜對早期定居者進行人身襲擊，還有偶爾在倉庫和住宅的夜襲——這些罪犯偷溜越過海港逃至中國領土，逃離這城市羽翼未豐的管轄範圍。與之相比，英國殖民地內的司法，往往對罪有應得或無辜之人都施以嚴厲、強制的懲處，並帶有明目張膽的種族偏見。正如我們所熟悉的歷史，新來的居民淪為了瑣碎政治算計的犧牲者，這個小島殖民政府一心要展示它嶄新的統治地位，頒佈一項又一項法令，似乎為了加強自身重要性，但結果卻扼殺了人們樂觀投入商業活動的精神。

對這座初生城市影響最為深遠、又最可怕的創傷之一，就是接連不斷、突如其來的疾病爆發。它塑造了殖民者在規劃和建設定居點及其基礎設施時的應對策略；也承載了許多隨之而來的人為創傷，留下象徵性的深刻印記。「可怕」，在於熱病首先突然在城市各地爆發，不時以殘酷的方式肆虐。香港島上為數不多的專業醫療人員提出了一些理論來解釋致命熱病，同時支撐他們成效未明的應對措施。在細菌學出現以前的世界，惡性現象的根源被認為源於這幾項因素：在水中；蕪生蔓長的植被裏；來自衰變的岩石內部；不尋常的電磁力方向偏差；或是晌午時分的日光照射，乃至因此蔓延的空氣污染物。如果不採取集體行動改革城市自身，最終將無法擺脫「瘴氣」。

當香港居民面臨這些威脅生命福祉的情況，他們對於這個殖民地的看法，以及外界遙遠的觀察者對這片土地的認識，都成為了巨大壓力來源和變革的推動力。我們必須連同這些因素加以考察才能做出有意義的研究，認識到這座城市如何發展和建立起它初始的物理空間和行為模式。本書旨在詳細考察香港島城市發展最初九年的歷史進程，呈現期間一系列相互關

聯的事件，及其起因與反響，論證這些歷史事件如何為香港奠定一套「充滿偶然性」的城市基本法則，乃至成為未來的發展模板。

瘧疾作為瘴氣

本書無意將整個城市的誕生故事和都市形態完全歸因於瘧疾的存在。人們可從經濟和商業抱負的視角，亦可從迅猛的多民族遷入及其帶來的安全威脅，來觀察殖民地香港城市與建築的「誕生」。或者，也可從傳統史學家角度，通過殖民地的政治和地方政府發展，以及與中國清政府的關係來考察。然而，在所有能解釋城市實體發展決策過程的潛在命題中，當時對「健康」和「生命福祉」的關切，無疑是再也自然不過的關聯紐帶。它超越其他任何主題，貫穿並連接起各條分叉的故事線，從而使早期殖民者對於空間和話語構建的認知和應對有了共同的合理解釋。在這些關切裏，沒什麼比致命疾病更讓人心神不寧，它似乎在每年熱季來來去去，但症狀、爆發地點、毒性卻始終難以預測和防範。1843年，歐洲殖民者甚至以島之名來命名這場糟糕至極的瘟疫爆發——「香港熱病」(Hong Kong Fever)。

另外，雖已有許多有關世界殖民地的案例研究，分析了疾病對城市的影響(包括政府衛生政策的變化、房屋與建築發展)，也細察了19世紀熱帶和溫帶地區、殖民地和宗主國內城鎮衛生基礎設施的形成；但是，甚少像殖民地香港的早期那樣，能提供如此生動和戲劇性的研究案例。當時儘管港島南部已有大量華人居民，但新來的定居者將港島北部的沿岸土地視為一塊白板、一片處女地。如此，為了應對惡疾，殖民者從根本層面、全力以赴地對地形和基本居所的初始形態進行深刻反思。瘧疾，實實在在地，是一股扭轉香港殖民地創始故事的力量。

「瘧疾」一詞，源於意大利語 *mal'aria*，又源自拉丁語 *malus aria*，意指「惡劣」或「邪惡的空氣」，這暴露出至少在1880年代以前，人們仍普遍認為瘧疾是由空氣傳播的。1840年代，大多數歐洲醫學專業人士持有的主流觀點是「瘴氣理論」和「傳染理論」。如羅伊·波特 (Roy Porter) 所言：「如疾病來自生病的人體，稱之為『傳染病』；如來自沼澤和積水，則稱之為『瘴氣』。」² 而「細菌理論」是醫學界到了1860年代中葉才提出的假說。³

1850年，總醫官威廉·摩利臣 (William Morrison) 在向英國議會提交的香港政府年度藍皮書中，思考道：

被稱為「瘧疾」的這種難以名狀的大氣影響，它對人體的確切作用仍是巨大謎團。只有當我們能解釋賦予物質以形態的吸力和斥力原理時，只有當萬事萬物得以在空氣中運轉而不發生碰撞時，謎團方可被揭開。⁴

因而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所謂「香港熱病」真是「瘧疾」嗎？**本研究不試圖以當今認知來回答這個問題，部分原因是我們現在所知的「瘧疾」未必是當時理解的瘧疾。這本質上是定義問題。「瘴氣理論」屬於病原學（研究疾病成因）的一個分支。從西方古代至19世紀後半葉，人們普遍認為疾病會由「腐爛分解的有機物、腐壞的肉和蔬菜所釋放的氣體」引起。⁵ 在顯微鏡發展起來、人們更關注病理學（研究引致疾病的發展機制）之前，是無法準確描繪人體細胞和組織變化的，亦不可避免會將病因轉嫁給外部環境。1840年代，軍隊的歐洲醫生一致認為，在（他們美其名曰）「中國遠征」——即多在沼澤地或稻田周邊展開的軍事行動——期間發生的熱病，罪魁禍首是瘧疾。

……在遠征中國的海軍部隊中流行的疾病包括：持續熱病、間歇熱病、急性痢疾，以及偶發的霍亂。

現在已知，持續和間歇熱病及某程度的痢疾，都由「瘧疾」或「沼澤瘴氣」引起……⁶

瘧疾隱秘的運作機制，只有結合多種病徵才能識別。例如，1844年一位署名「醫學人」(*Medicus*)的作者(看起來是醫生)致信香港本地報刊，發表他對瘧疾性質和保護措施的看法。

它是像熱力般無形、神秘的介質，但對人體危害極大。我們無法解釋它的運作機制，更不知如何控制其產生、擴散和影響；但我們完全肯定的是，這種毒物會在特定季節和地點溢出地球表面，當接觸到人體時，我們就會患上熱病、痢疾及其他疾病，每年尤其在熱帶地區摧毀無數生命。⁷

瘧疾因此被認為是導致熱病的外部介質，而不是熱病本身。這一點很重要。在人們了解細菌理論和感染的概念之前，瘧疾被視為瘴氣或蒸氣：一種模糊的氣態現象，它使人體得病、變虛弱，以致最終發熱。從這方面理解，即以當時的醫學範式來說，可以認為香港和中國其他沿海地方一樣，成為了引發瘧疾和熱病的場所。這些發熱症狀，其實是我們現在所知的瘧疾所引起的——大多數情況是由雌性「瘧蚊」(作為「病媒」)傳播的「瘧原蟲」(一種單細胞寄生物)所致。而用於查證這一推斷的記錄被當時的醫學理論傾向所忽視。⁸那麼，對於「香港熱病真是瘧疾嗎？」，答案有兩個：一是基於舊時理解的「對，當然是」，二是基於目前認知的「對，也許是」。本書主要關心前者，因為這其中囊括了大大促成香港1840年代實體空間發展的觀察、觀念和應對措施。換句話說，本論述將著重於香港島這個早期殖民地的**建成環境**，以及關於認知是如何形塑現實的。學者亞瑟·史達林(Arthur Starling)用了不同於本書的方法，從現代醫學角度判斷「香港熱病」背後的疾病。而他同樣總結道：「就現有的香

港熱病記載而言，不管它是一種或是多種疾病……可以很肯定，瘧疾至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⁹

然而，因果關係並不是那麼簡單明瞭。一些醫療史學家如蘭達爾·帕卡德 (Randall M. Packard) 主張，瘧疾的流行及其傳播模式，在過去是源於環境的激烈變化。這些變化往往來自複雜的人為因素，同時因瘧疾趁虛而入的特性與頑強生命力，使得預測瘧疾爆發變得困難。帕卡德認為，流行病爆發需要三個基本要素：當地存在傳播瘧疾的蚊蟲；有利於這些蚊蟲繁殖的環境變化，本質上是指擾亂原初水流方向及水源分配的變化；大量新來人口的遷入，尤其是由瘧疾攜帶者或「未獲免疫的」個體所組成的人口。¹⁰ 以上三要素，處於殖民化早期的香港全數具備，讓瘧疾的相關論斷特別可信。殖民者對環境的擾亂始於修建沿海主幹車道——皇后大道，他們阻塞水渠（溪流），翻動泥土，從而造成繁殖蚊蟲的大量積水，建築開挖所產生的遍地坑窪更是加劇了問題嚴重性。與以往的歷史記載相反，從軍方統計數據來看，瘧疾似乎是由英國軍隊的患病士兵無意中帶進香港島的，「未獲免疫的」健康士兵因此容易受到1841和1842年間第一波疾病侵襲的影響。就如殖民地醫療史學家馬克·哈里森 (Mark Harrison) 所斷定，「戰爭會從幾方面促進瘧疾傳播：大量軍隊和平民的遷移，將寄生蟲及病媒引進到它們未抵達過的地區；水壩和堤岸的破壞導致低陷地區被淹，為蚊蟲提供理想的繁殖場所。」¹¹ 由於香港爆炸性的城市建設，以及殖民地成為了接收病兵的軍事根據地，到1843年初，已有相當數量的人群感染疾病。而這一數量級幾乎決定了當年稍後發生襲捲全城的流行病。不過，如本書所述，瘧疾或「沼澤瘴氣」——這一熱病、腹瀉和痢疾的不明介質，其來源並不明確，這種難以歸因的特性，就使它很容易成為某些特殊利益集團或出於私人意圖的政治操控工具。

瘴氣被當作一種從自然地貌生發的致病因子，最早可追溯到希波克拉底（西元前 460–377）的記載，但在更新近的時期，它也很大程度激發了浪漫主義運動（Romantic Movement）的想像力。瘴氣能彰顯出上帝之手正壓制那些試圖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傲慢人類。它也可能被一群日益壯大的抗議者利用，他們在 19 世紀初期寫道，英國軍隊在熱帶氣候下有與生俱來的危險，歐洲人體質和熱帶氣候極不相容。法蘭西·丹比（Francis Danby）的畫作《尤巴斯樹》（又稱《爪哇島上的毒樹》）就是鮮明例子，它展現出「瘴氣」籠罩的異國熱帶地區對人們情感和宗教的影響，以及它如何作用於 19 世紀初英國人的心智（圖 1.2）。



圖 1.2 法蘭西·丹比·油畫·《尤巴斯樹》（又稱《爪哇島上的毒樹》）·1820。
©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丹比偏愛與末日和聖經相關的主題。他於1819年創作此畫，並於次年在倫敦展出，這幅畫為丹比贏得了入選英國皇家學院的資格。畫中的「樹」是一根單薄細長的尖刺，從一片無比荒涼的景觀中兀然伸出，它的存在毒害了整片地面。畫面右下方屍橫遍野，旁邊是最後一位悲痛欲絕的倖存者（顯然是個面色蒼白的歐洲人），他困於其中，卻徒勞地試圖保護自己免於毒樹的侵害。這幅畫牢牢抓住了英國人的想像力，但它又並非人們所想像的只是一種寓言。這棵樹，或至少這片爪哇島末世景觀，實際上被認為是真實存在的。

1846年12月，倫敦《文學公報》(*Literary Gazette*)為香港當地焦慮不安的讀者重刊了一篇文章，在丹比畫作的26年後，寫下了與畫中的假想現實驚人雷同的環境描述。

死亡之谷。以下是關於尤巴斯樹起源的可能解釋：「爪哇島存在一個真實的死亡之谷；它被稱為毒谷，裏面充滿了從地表裂縫排出的高濃度碳酸氣體。當人類或動物進入其中，將無法回頭；他們當察覺到自己已深陷於四周毒性空氣的影響之時，方才意識到危險……飛入毒氣的雀鳥墜落身亡；被拋進去的活禽還未觸底便死去，谷底散落著各種死於毒氣的動物屍體。」¹²

香港島也許沒被指為類似的死亡之地，至少一開始不是。但隨著他們1841年佔取香港島，新來殖民者的情況很快就發生轉變。不久後，瘧疾連續幾年在駐紮軍隊中反覆爆發，軍隊製圖師在測量圖中直接粗暴地標記出山脊和溝壑的位置，並以此為基礎進行建設——溝壑越來越被視為瘴氣所在地，而山脊則被當作阻斷有益通風的屏障(圖1.3)。在地形分析中，這種通風技巧對軍事安全和軍隊生存至關重要。這幅官方地圖是在香港熱病消退時繪製的。如果其直白粗暴的圖形還不夠清晰的話，軍隊繪圖員還



VICTORIA

HONG-KONG

A Contingent Barracks
on hillside
B Site of proposed
Barracks
(C.R. & L. 14, June 1857)

X. permanent Buildings, erected by the
Govt. 1857, situated in the part
of the R.O. Report.

Y. Building & barracks as quarters, Order by Commr
in C. Quarters of part of the Regt. 1857.

I.K.S. M. for the Ordinance, 1857
recommended to the
Resident, 1857, as the
most suitable for the
purpose.

A map of the
Victoria Harbour
with the names of the
ships and boats.

* The pencil lines show the proposed
central battery, and the relative positions
of the 9 & 5 Gun Batteries, as shown from
Plan dated 31 May 1857 (D.B.)

B. 1857

以文字補充道：「土地從北岸陡然升起，形成陡峭山脊和深深的溝壑——最後終止於一條東西綿延的巍峨山脊……上色部分表示軍事駐地所處的地形。」¹³

有人會說本書某種程度上是一項「醫療地形學」研究。這屬於醫學研究的分支，於19世紀初在英屬印度興起，隨著孟加拉府總醫官詹姆士·拉納德·馬丁爵士 (Sir James Ranald Martin) 出版頗具影響力的著作《加爾各答的醫療地形學註》(*Notes on the Medical Topography of Calcutta*, 1837) 而發展起來。顧名思義，該著作基於相信特定地區會對人類健康產生固有的惡性影響，來對地形地貌進行製圖和測量。馬丁爵士就如前人孟德斯鳩，也相信環境和氣候直接影響了我們的社會特徵，進而最終影響政治制度的本質。¹⁴ 在歐洲的版圖擴張和全球殖民時期，即17至19世紀，有關氣候和地形影響的觀點都相當具有說服力。如大衛·亞諾德 (David Arnold) 所述，19世紀之前，資料是「以敘事形式呈現的，當描述某一地區多年遭受流行病，尤其在該病與氣候和季節有關之時，對死亡人數和死因的了解都僅有印象性的模糊概念」。¹⁵

在1820至1840年代期間，圖繪疾病的方式發生了變化，開始強調測量的統計方法，因而讓人們產生了已對不可捉摸的現象具有精準診斷的錯覺。山脊和溝壑的陰影線也消失了，它們內含的情感衝擊力，被等高線那種扁平化的經驗主義給消解了。我們將了解到，第一份針對主權領土公開出版的等高線測量圖，正是香港島的。亞諾德寫道：「就19世紀初而言，上述變化的普遍影響是，為此前籠統的熱帶氣候危害提供了統計和科學上的精確性，並推進了擊退這些危害的應對措施。」¹⁶

◀ 圖 1.3 量地官署，《香港維多利亞城平面圖》，軍營山（現金鐘）（局部），1845年5月12日。
墨水和水彩畫。© 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 London (WO 78/479)